

社會主義國家的華人組織

——古巴革命以來華人社團的歷史變遷與現狀分析

楊新新

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提要

古巴革命後，由於本地社會政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古巴華人社團確也曾一度受到較大程度的衝擊與影響。不過，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的古巴華人社團，卻並未如前人所言，出現類似部份蘇歐或亞洲社會主義國家華人組織完全遭到「禁絕」的情況。反倒是受益於古巴相對特殊的社會主義制度環境的優勢，本地華人社團不但得以保留，並部份維持古巴革命前互助福利、延續族裔文化、聯繫家鄉與在地國等功能結構。同時，借助冷戰結束前後古巴政府對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制度的調整與「更新」，本地華人社團非但在經濟實力上實現較大幅度的發展與提升，甚至還在本地公共政治生活中，獲得一定的話語與博弈空間。當然，儘管如此，由於社會主義政治形態下，古巴社會長期與外界封閉隔絕，本地社會經濟發展

楊新新，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體育東路140-148號南方證券大廈6樓628室，電郵：yangxinxin870325@126.com。

本文為《廣東華僑史》專項課題委託項目「粵籍古巴華僑華人報刊、檔案、口述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GD16TW08-1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全文曾提交「2019《廣東華僑史》學術年會」，得到五邑大學石堅平教授、中山大學袁丁教授等學者的批評與指正。論文資料收集整理與古巴實地田野調研期間，曾得到暨南大學黃卓才教授、四川外國語大學重慶南方翻譯學院趙越老師、李柏達先生、黃仙花女士、朱霖先生、許昱恆先生、朱頌瑜小姐以及哈瓦那大學 María Teresa Montes de Oca Choy 教授、韓慶山先生、Laura 小姐、Melody 小姐、呂美枝(Mitzi Espinosa Luis)小姐、鄧小榮(Jorge A. Alay Jo)先生、郭昕江先生、劉錦芳女士等提供幫助。廣州致公黨劉麗萍女士、古巴共和國駐廣州總領事 Isabel Perez Suarez 女士在赴古巴簽證的辦理上提供便利。全文寫作與修改承蒙博士後合作導師廈門大學范宏偉教授的支持與指導，亦蒙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給予中肯意見與建議。特此一併致謝。惟文責由本人自負。

水準總體而言仍相對滯後。加以受歷史傳統與現實政治經濟結構等影響，目前比之世界其他地區的華人組織，古巴本地華人社團也存在着整體會員數量與組織規模不大、「本土地化」色彩較濃鬱、參與全球性「跨國主義」活動之頻率不高、華人社團內部分化明顯等問題，顯示社會主義制度下，古巴華人社團相對特殊的路徑發展模式以及較為多歧複雜的跌宕起伏命運，成為目前全球華人社團中之特有案例。

關鍵詞：古巴、華人社團、社會主義、歷史、現狀

作為海外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華人社團長期以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關注。^①不過相較於研究者對不同時期世界各地形色不一華人社團案例的分析，囿於資料獲取以及研究條件等的限制，學界關於冷戰以來社會主義國家華人社團的討論與研究成果相對有限。^②事實上，上述情況也在古巴華人社團的研究中得到反映。作為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華僑華人最早的遷入地之

-
- ① 目前各方已就華僑、華人、華裔以及中國新移民等的定義與概念做了較為深入的分析與討論。根據既有研究的分類與定義，一般認為出生地為中國，長期僑居中國以外地區，仍持有中國國籍者為華僑；而長期僑居中國以外地區，已加入他國國籍者為華人。從古巴的情況來看，冷戰以前遷來古巴的中國人人數已不足百人，儘管他們中部份人已加入古巴國籍，但研究者與當地部份受訪者一般習慣將古巴革命前遷來古巴定居的中國人稱為華僑華人。考慮到上述持有中國國籍者，已基本融入古巴當地社會，與中國以及家鄉間的聯繫非常有限，為行文方便，本文採取國際學術界的通行辦法，將之統稱為華人 (Overseas Chinese)。對於華裔的定義，目前學術界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的華裔，與華人的定義比較接近，基本是指在中國出生，遷往中國以外地區定居，並取得當地合法國籍者；或者在中國以外地區出生，擁有外國國籍，且具有華人血統者。而狹義上的華裔，則一般專指出生地為中國者，遷到僑居國定居生活後，在僑居國所生並取得僑居國國籍的子女。根據筆者本人以及相關研究者在古巴的實地田野調研可知，古巴本地受訪者與華人社團一般將在古巴本地出生、三代以內擁有華人血統者，稱為「土生唐人仔」或華裔（雷競瑤，《古巴華僑口述歷史報告》，香港：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2014，頁5-6）。結合相關定義與古巴的實際經驗，在本文的行文中，筆者採納古巴本地受訪者的看法，將在古巴本地出生、父母輩或祖父母輩為華人者，稱之為華裔。目前這些華裔多數參加了本地華人社團，據當地華人社團初步統計，截止2018年前後被古巴社團承認的華裔人數約為2,500左右〔訪談記錄：楊新新、李柏達訪問鄭啟巨集（古巴中華總會館副主席），2018年7月6日，哈瓦那中華總會館〕。至於中國新移民，則是一個相對於華僑華人的概念，一般指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遷往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生活定居的中國人。他們或保留有中國國籍，或已加入當地國籍。目前他們屬於移民群體中的第一代，與祖籍國或家鄉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根據筆者本人的初步統計，目前古巴的中國新移民約有50人左右。他們中的部份源於冷戰結束後前來古巴經營外貿生意的商人；另有部份則是2006至2011年前後經由中國公派留學生計劃前來古巴留學，並於畢業後留在本地，從事旅遊、商貿與餐廳等經營的留學生群體。對於古巴的中國新移民群體，筆者擬另辟他章，做專門系統的分析。相關問題的綜合討論可參見王庚武著，天津編譯中心譯，《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Khun Eng Kuah-Pearce, Evelyn Hu-Dehart,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eds. Khun Eng Kuah-Pearce and Evelyn Hu-Dehar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8。
- ② 除古巴外，冷戰以來華僑華人主要分佈於亞洲的越南、民主柬埔寨、朝鮮，以及歐洲的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大體而言，在上述社會主義國家，華人社團組織的活動與發展基本受到限制或遭到禁止。直至冷戰結束後，其組織與活動才有所恢復。當然，由於受在地國與中國大陸間關係的變化，以及不同國家在處理外僑組織上的態度有一定差別的影響，當地華人社團組織的命運又有所不同。如越南華人社團組織遭到查封與禁止，主

一，由於古巴革命前古巴本地現代化程度與社會發展水準較高，^③ 古巴華人經濟相對富庶，故而其時華人社團組織一度相對興盛發達，^④ 研究界已對這類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與探討。^⑤ 相對而言，對於古巴革命後，尤其社會主義時期本地華人社團的論述，由於自1959年以來古巴社會進入相對封閉

要與1970年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間的關係交惡有關（珠海著，甄中興譯，〈越南的華人社團〉，《民族譯叢》，1993年，第5期，頁21-43）。民主柬埔寨的華人社團組織被徹底清理，與波爾布特(Pol Pot)等人對本地華人及外僑群體的「大清洗」有關（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ommunities as Method*,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2015）。冷戰結束後，因中國大陸、臺灣、新加坡在越南、柬埔寨等國投資的不斷增加，以及柬埔寨等與中國大陸方面的不斷交好，當地的華人社團組織得以迅速恢復。朝鮮的華人社團組織，由於冷戰以來中朝兩國間的「特殊盟友關係」，從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開始，其基本由朝鮮政府全面接管，經朝鮮政府統一整合後成立華聯會，由朝鮮政府提供經費，在朝鮮勞動黨的指導下開展各類活動，並延續至今（朱慧玲，〈東北亞地區僑情概述〉，《八桂僑刊》，2002年，第3期，頁54-59）。至於前蘇聯的華人社團組織，除莫斯科、伊爾庫茨克等地的少數華人社團因蘇中外交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在蘇聯政府的嚴密監控下被保留外，多數華人群體在蘇聯建立後，或被驅逐出境，或被疏散至偏遠農村，相應的社團組織則被予以取締。直至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成立後，華人社團組織才得以在俄羅斯境內重新恢復活動（鄧蘭華、張紅，〈俄羅斯華僑華人與俄聯邦的移民政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25-37）。

- ③ Hugh Thomas, *Cuba: the Pursuit of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1096.
- ④ Julio A. Leon, Rene Leon, *Requiem por el Chinatown de la Habana* (Stanford: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7.
- ⑤ 華人群體遷入古巴，最早始於1847年。由於這一時期古巴大力發展蔗糖經濟，各甘蔗種植園需要大量勞動力，西班牙殖民當局在英、法、美等國相繼禁止從非洲輸入黑人奴隸的背景下，決定從中國等地招募華工。1847至1874年前後近三十餘年間，約有近十萬餘名契約華工遷往古巴。與此同時，從1860年代開始，由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等地掀起排華浪潮，約五千多加利福尼亞華人再移民至古巴，並開始在哈瓦那等地建立進出口公司、華人社團與文教機構等組織（Juan Pérez de la Riva, *Los cultes chinos en Cuba, 1847-1880: contribución al estudio de la inmigración contratada en el Caribe*,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00, 178）。到20世紀初，由於古巴的獨立以及移民政策較為寬鬆，又有大量華人通過自有移民的方式遷入古巴。此後，由於古巴政府對移民政策的收緊，以及第二次大戰爆發，華人移民遷入古巴一度中斷，直至1946年中國國內國共內戰爆發後，又有數以千計的中國移民遷入古巴，直至古巴革命以後，這一進程徹底被終結。據1959年古巴革命前，相關資料的統計與研究，當時全古巴境內約有華人近兩萬餘人，佔古巴國內總人口數的0.44%，其中42%的華人主要聚集在哈瓦那地區。華人在古巴本地主要以開辦零售雜貨店、洗衣店、果蔬店以及餐廳等謀生，多數華人擁有的產業資本約在1,000美元左右（Ching Chieh Change,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A Preliminary Geographical Surve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uba and Jamaic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56, 54-56, 96-97）。在哈瓦那、聖地牙哥等華人

狀態，受資訊隔絕與整體環境限制等影響，各方學者對此類問題着墨不多。^⑥ 有限的研究成果也因先入為主的問題導向，而近乎一致地認定，古巴革命後受中古關係調整以及古巴國有化運動與族裔整合政策(policy of ethnic integration)等的衝擊，^⑦ 古巴華人社團處於不斷衰敗之中，至今甚至有趨於消亡之勢。^⑧

相對集中的地區，華人一般依據同業、同域與同鄉等關係，建立相應的社團組織，並開辦華人醫院、劇院、學校與宗教場所等。同時，當時華人群體也因中國國內內戰的關係，在政治上分為親近中國共產黨的左翼華人，與在政治上支持國民黨的右翼華人。其中左翼華人成立古巴華僑擁護民主大同盟(Alianza Nacional de Apoyo a la Democracia China)等組織，一定程度上參與並支持卡斯特羅等領導的革命行動。至於右翼華人群體，則主要在政治上支援國民黨，並以國民黨駐古巴支部等為主要活動組織。有關各方對古巴革命前本地華人社會與華人團體等問題的研究綜述可參見袁豔，《融入與疏離：華僑華人在古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頁3-11。關於古巴左翼、右翼華人群體的分化研究可參見 Duvon Clough Corbitt,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1957* (Wilmore, KY: Asbury College, 1971), 113-115；龐炳庵主編，《中國人與古巴獨立戰爭》（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頁67-68。

- ⑥ Mauro García Triana, Pedro Eng Herrera,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09), "Authors's Introduction," xxxiii-xxxiv.
- ⑦ 關於古巴革命以後古巴革命政府處理國內族裔問題的研究一直相對有限。近年來包括部份古巴學者在內的研究者已指出，卡斯特羅等人在革命成功後一直致力於消除白人與黑人間的族裔差異，並力圖將西班牙殖民文化傳統與非洲黑人文化遺產整合為一體，以之建構現代古巴民族國家文化。至於對古巴境內的華人群體、印度裔群體以及阿拉伯穆斯林群體等的處理，隨着古巴革命後卡斯特羅政府對蘇聯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部份效法，以及與上述族裔群體祖籍國之間關係的調整，從1960年代中後期開始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古巴革命政權雖然承認這些族裔群體作為古巴現代民族國家內部的少數群體(minoría nacional)的基本地位，並保留其相應的社團組織與協會，但同時卻禁止學者對這類少數族裔群體的文化及相關爭議問題進行研究與討論，並逐步禁止上述族裔群體社團協會公開開展祖籍國語言教育、文化藝術表演與節日慶典等活動，以期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使這類少數族裔群體及其後代徹底融入古巴現代民族國家之中。對於古巴革命政府這一處理國內少數族裔群體的策略，研究者一般稱之為族裔整合政策或族裔整合進程(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相關討論參見 Leslie Bethell, *Cub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9-120; Elvira Antón Carrillo, "Ideas of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Press During the Cuban Revolutio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31 (Supplement s1, 2012), 7-16.
- ⑧ 有關古巴革命以來本地華人社團的討論參見：Pedro Cosme Baños, *Los chinos en Regla (1847-1997): documentos y comentarios* (Santiago de Cuba: Editorial Oriente, 1998); Frank F. Scherer, *A Culture of Erasure: Orientalism and Chineseness in Cuba, 1947-1997*, unpublished MA. Thesis, York University, 2000; Mauro G. García Triana, *Los chinos de Cuba y los nexos entre las dos naciones* (La Habana: Sociedad Cubana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Filosóficas, 2003)；周莉，〈古巴華社掠影〉，《海外縱橫》，2004年，第5期；Miriam

然而，通過研究者對相關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在古巴的實際田野調研可知，儘管古巴革命以來，受內外條件變化的衝擊與影響，古巴華人社團無論數量或組織規模較之從前總體上確也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減。不過自上世紀50年代末至今，古巴本地華人社團非但從未完全中斷過活動，且其依舊部份延續並發揮着革命前延續族裔文化、聯繫家鄉與在地國以及為本地華人華裔提供互助與福利等功能與作用。^⑨ 據古巴中華總會館統計，截至2018年，古巴境內除首都哈瓦那華區尚存有13家華人社團外，^⑩ 哈瓦那以外五個地區也另有五家地方華人社團仍在維持運營。^⑪ 對此，研究者不禁要問，古巴革

Herrera Jerez, Mario Castillo Santana, *De la memoria a la vida Pública: Identidades, espacios y jerarquías de los Chinos en la Habana Republicana (1902-1968)* (La Habana: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Cultura Cubana Juan Marinello, 2003); Alberto Consuegra Sanfiel, “Las sociedades chinas de La Habana: Una mirada histórica desde el presente,” *Humania del Sur* 4: 7 (2009): 65-81; 高偉濃, 《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下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2); Kathleen Maria López, *Chinese Cubans: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3); 劉葉華, 《他鄉·故鄉:拉美華人社會百年演變研究(1847-197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Adrian H. Hearn, *Diaspora and Trust: Cuba, 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6); Mitzi Espinosa Luis, *Huellas de China en este lado del Atlántico* (La Habana: Editorial José Martí, 2016); 黃卓才、袁豔編, 《從契約華工到改革先鋒:中國人抵達古巴170周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 Julio Gerardo Hun Calzadilla, *Pensar el Barrio Chino: Crónicas de Una Presencia* (La Habana: Ediciones extramuros, 2017).

⑨ Kathleen Lopez, “Renace el sueño: Remaking Havana’s Barrio Chino,” in *In Orientalism and Identity in Latin America: Fashioning Self and Others from the (Post) Colonial Margin*, ed. Erik Camayd Freixas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3), 157-161.

⑩ 哈瓦那華區(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為古巴當地人對哈瓦那中國城或唐人街(Chinatown)的俗稱, 位於哈瓦那老城區桑哈大街(Zanja Street)一帶, 始建於1858年前後, 曾經為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華人聚集區。目前哈瓦那華區為古巴華人社團會所與中餐廳集中所在地, 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的教學地點目前也位於哈瓦那華區。關於哈瓦那華區的詳細介紹可參見: “The Chinese Presence in Havana,” 2018年6月22日, <https://www.cuba1847.com>。

⑪ Casino Chung Wah, *Las Sociedades Chinos de Cuba* (La Habana: Casino Chung Wah, 2018), 1. 目前哈瓦那地區尚存的13家華人社團包括: 中華總會館、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華僑社會主義同盟、陳穎川堂、黃江夏堂、余風採堂、李隴西堂、龍崗親義公所、溯源堂、安定堂、至德總堂、中山自治所、九江公會。至於哈瓦那以外地區的五家華人社團則分別為聖克拉拉(Santa Clara)民治黨支部、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uba)民治黨支部、關塔那摩(Guantánamo)民治黨支部、謝戈德阿拉維(Ciego De Avila)民治黨支部、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民治黨支部。而從現有13家華人社團的類型來看, 中華總會館由於其在古巴革命前便長期作為「古巴華僑華人社會的最高公共機關」存在; 古巴

命後，在本地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古巴華人社團何以未如既有研究所言為革命政權所「徹底消滅」，^⑫而能夠保存並延續？換言之，作為難得一見的案例，社會主義國家形態下，古巴華人社團經歷何種歷史演變過程，以至其得以賡續不絕至今？而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環境，古巴華人社團的功能結構與路徑發展模式，較之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華人社團，又呈現出何種異同，值得後來者作進一步的追問與探討。

一、社會主義展開初期前後古巴華人社團的保留與改造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古巴革命成功之初，以左翼革命為理想、追求社會

革命後，如後文所言，其又一度在辦理僑匯郵寄、照顧安排老僑回國與喪葬等方面發揮較為重要的作用，因此，目前古巴中華總會館已從此前與各華人社團相對「平行」的獨立社團，被古巴政府調整為帶有半官方色彩的「社團聯合會」，一定程度上擁有協調各華人社團解決目前古巴華人社會共同面臨的相關公共議題的職能。有關哈瓦那中華總會館在古巴革命後功能上的發展與變化，後文有詳細討論。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以及民治黨在聖克拉拉、聖地牙哥、關塔那摩、謝戈德阿拉維、西恩富戈斯等地的支部，則由古巴革命前具有一定政治立場的洪門致公黨轉變而來。目前其政黨性質已徹底消失，成為為本地華人華裔謀取社會福利的重要社團組織之一。同時，民治黨也是目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外地區仍保有組織建制，並繼續開展相應活動的華人社團(Mitzi Espinosa Luis, Violeta Luis Quintana, *The Hongmen Min Chih Tang de Cuba (1887-2012)*, Trans. Kathleen L pez, PowerPoint, 2012, 1-137)。華僑社會主義同盟，與民治黨類似，其前身由古巴革命前與蘇聯、中共等關係密切的左翼華人等組成。由於古巴革命後，古巴革命政權與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殊外交關係，冷戰終結以前，華僑社會主義同盟一度成為古巴本地各方面條件最為優渥的社團的組織。目前華僑社會主義同盟的政治性同樣已完全消失，轉為為本地華人華裔謀取福利的社團組織。參見 Mercedes Tania Crespo Villate, “Allanza Socialista China de Cuba,” Cátedra de Estudios sobr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Cuba “Las sociedades Chinas: Pasado y presente”, Casa de Altos Estudios Don Fernando Ortiz (CD), 2007。陳穎川堂、黃江夏堂、余風採堂、李隴西堂、龍崗親義總公所、溯源堂、安定堂、至德總堂，為姓氏社團組織，凡參加社團者，需為相應姓氏的後裔。由於通過姓氏與血緣紐帶最能維持華人群體的團結，目前古巴這一類型的社團組織保留最多，但僅見於哈瓦那華區。至於中山自治所、九江公會，則屬於地緣類型的社團組織，參加此類社團者，需為經由廣東中山以及南海九江等地遷來的華人及其後裔。同樣地緣類型的社團組織也僅在首都哈瓦那地區有保留。相關華人社團歷史的討論另可參見袁豔、張芯瑜，〈20 世紀上半期古巴僑團述略〉，《八桂僑刊》，2013年，第1期，頁28-31。

⑫ Cheng Yinghong, “The ‘Socialist Other’: Cuba in Chinese Ideological Debates since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209: 1 (2012): 210.

公平自居的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政權之所以未像東方式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對名聲頗為不佳、經濟上問題較多、以右翼國民黨華人居主的本地華人社團採取任何改造措施，^⑬固然與革命成功後華人社團迅速對革命政權表示歡迎與效忠有關，^⑭但更為重要的是，卡斯特羅等人在最初對待古巴革命的定義與理解上，並非如部份後見之明所言，具有明顯的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傾向，而是帶有相對溫和的人道主義與「綠色主義」的中間路線色彩。^⑮正如卡斯特羅本人後來所回憶的，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以前，其

⑬ 關於古巴革命前，本地華人社團為國民黨右翼華人所掌控，在古巴當地社會名聲不佳，經濟上賄選、貪腐等問題嚴重的記錄，參見黃作湛，〈古巴見聞錄〉，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華僑華人編（第十九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848-849。

⑭ 1959年1月，古巴革命成功後不數日，古巴中華總會館、古巴中華總商會等華人社團便登報向卡斯特羅與「七·二六」革命運動（1953年7月26日，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帶領下，150多名青年發起對蒙卡達兵營的攻擊。行動失敗後，卡斯特羅等人被捕入獄。1955年卡斯特羅獲釋後，同年7月為紀念攻打蒙卡達兵營的行動，他將其領導的反政府革命組織命名為「七·二六運動」組織。「七·二六」也成為卡斯特羅等領導的革命活動的代號——筆者注）表示了歡迎與敬意。當然這一做法，也是本地華人社團應對此前古巴政權更迭頻繁的常用手法。參見〈總商會函賀古革命成功〉，《華商報》（古巴），1959年1月6日。

⑮ 肖楓、王志先，《古巴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27。這裡之所以認為卡斯特羅等人領導的古巴革命具有人道主義與「綠色主義」（「綠色」為和平之意——筆者注）的中間路線色彩，一方面因革命運動發生時，美、蘇兩國主導的冷戰業已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政治活動，無不因此被牽扯其中。儘管卡斯特羅自己承認，他在大學期間讀過馬克思主義文獻和《共產黨宣言》，並與哈瓦那大學同蘇聯關係密切的共產黨員大學生有接觸，他領導的反政府行動，也主要意在針對當日與美國方面關係較為親近的古巴巴蒂斯塔(Rubén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政權。但與此同時，正如下文所言，由於「七·二六」運動與當時在古巴國內得到蘇聯支持的古巴人民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 PSP)之間並無太多的聯繫與交集，其最初目標也並非為實現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甚至這時的古巴人民社會主義黨還把卡斯特羅等人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冒險家」，卡斯特羅等人也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視古巴人民社會主義黨為其「運動的政治敵手」。而卡斯特羅本人在建立古巴革命政權初期更是公開表態：「世人正在辯論兩大政治與經濟意識形態的優劣，我們站在中間，努力抓緊自己的位置。我們稱之為人文主義……資本主義犧牲人；共產主義國家以其極端觀念，犧牲了人性。」不難看出，「七·二六」運動開展進行時期以及卡斯特羅等最初建立革命政權前後，其在美、蘇左右翼兩大政治陣營間並沒有明確的站隊與選擇。不過，因其反對美國與右翼的巴蒂斯塔政權，又受到當時歐美與拉美等地社會民主黨等泛左翼思潮的影響，故而可以將之視作一場由中產階級與民族主義者領導發動，具有「新左翼」（「新左翼」指相對於蘇聯主導的左翼共產主義運動——筆者注）色彩的中間路線的革命運動。又見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E. Bradford Burns)、朱莉·阿·查利普(Julie A. Charlip)

領導的政治軍事活動，很長一段時期內與蘇聯支持的古巴人民社會主義黨 (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 PSP) 之間並無太多交集。^{①⑥} 反倒是革命成功後不久，卡斯特羅本人便以「民族主義改革者」的形象出訪美國，會晤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 (Richard Milhous Nixon)，試圖得到美國方面對革命的同情與支持，^{①⑦} 故而，古巴革命成功後初期一段時間內，為維持與美國以及同美國關係密切的臺灣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古巴革命政府對與國民黨方面關係密切的本地右翼華人社團並未採取任何限制行動。^{①⑧}

當然，與此同時，由於卡斯特羅等領導的古巴革命本身帶有較強的左翼色彩，本地部份左翼華人對革命頗有貢獻與支持，^{①⑨} 考慮到未來可能與蘇聯、中國大陸等社會主義左翼國家建立並發展相應的外交關係，^{②⑩} 因此，革命成功後未久，古巴革命政權又允許與蘇共、中共關係密切，被巴蒂斯塔 (Rubén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 前右翼政府查封的本地左翼華人社團古巴華僑社會新民主主義同盟 (Alianza Nueva Democracia de China en Cuba) 等組織重新登記註冊，恢復活動，^{②⑪} 並同意中國大陸的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在哈瓦那設立分社。^{②②} 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帶有明顯左翼革命色彩的古巴革命政府未來對待本地華人社團的態度或已初現端倪。

古巴革命政權決定加強對本地華人社團的改造與整治，始於1960年2月前後。1960年代初，隨着古巴革命政府此前推行的帶有左翼民族主義色彩的土

著，王寧坤譯，《簡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現代化進程的詮釋》（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頁271；Luis Martínez Fernández, *Revolutionary Cuba: A Histor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4), 22-44。

①⑥ C. Wright Mills, *Listen* (Yankee: Ballantine Books paperback, 1961), 106.

①⑦ Olivier Dabène, *América Latina en el siglo XX* (Madrid: Armand Colin Éditeur, 1999), 32-33.

①⑧ 事實上，直到1960年9月中國大陸與古巴正式建交以前，古巴革命政府與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仍然一直保持有外交關係。參見 R. Heifetz, “A Visit to Cuba,” *The Island Times* (Puerto Rico), 18th November, 1960。

①⑨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談吳帝胄（Pedro Eng Herrera，古巴華人研究學者），2018年7月25日，哈瓦那瓜納瓦科阿(Guanabacoa)吳帝胄先生宅。

②⑩ 陳久長，《卡斯特羅與古巴——出使島國見聞》（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27。

②⑪ Pedro J. Eng Herrera, *Breve Reseña Sobre La Lucha Revolucionaria de La Comunidad China en Cuba 1920-1960* (Guanabacoa: Museo de Guanabacoa, 2001), 2-23.

②②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489。

地改革、外資企業稅收法等經濟社會政策，²³ 損害了美國在古巴經濟利益，美古兩國關係由此不斷交惡。²⁴ 為避免可能因美國干涉造成的對古巴革命政權的衝擊與影響，古巴革命政府開始積極主動向社會主義陣營靠攏。²⁵ 此後，一方面出於防備並整頓與美國、臺灣關係密切，由右翼華人控制的本地華人社團，以達成消滅革命隱患，掌握並控制華人社區的考慮，²⁶ 另一方面為解決部份支援革命的左翼華人在革命成功後之就業問題，古巴革命政府決定組織部份參與且對革命頗有貢獻的左翼華人成立黃淘白華人民兵隊(Milicia Popular china Brigada José Wong)，以接管與整理此前由右翼華人控制的中華總會館等重要華人社團。²⁷ 同時，古巴政府也另派部份與革命政府關係密切的左翼華人，通過「指導備案、註冊」等形式，加強對各地域、姓氏華人社團的管理與控制。²⁸ 此外，為向蘇聯與中國大陸方面示好，古巴政府還加緊對已恢復重建並合法註冊，且與蘇聯、中國大陸關係密切的左翼華人社團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Alianza Socialista de China en Cuba)的扶持，以之取代與美國、臺灣關係緊密，右翼色彩極強的華人團體如國民黨駐古巴支部等，並將其相應的財產、房屋等予以沒收後分發給左翼華人社團使用。²⁹

由上述措施可見，古巴革命後，革命政府開始着手對本地華人社團進行控制與整頓，無疑與當日古巴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變化有關。但另一方面，即便如此，古巴革命政府在處理華人社團的態度與做法上，除將少數極右翼華人團體予以查禁外，對於本地多數華人社團，並未完全取締，而是代之以組織左翼華人予以接管、改造。同時，部份左翼華人社團則因古巴革命政府對華人社團的改造與整頓，而得到迅速恢復與發展。這說明古巴革命後，革命政府因內外條件變化，在政治、經濟層面上開始向社會主義國家靠攏的行動，已影響到本地華人社團的發展進程。而部份左翼華人在革命前參與並支

²³ 何塞·坎東·納瓦羅著，王玫譯，《古巴歷史——枷鎖與星辰的挑戰》（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頁277。

²⁴ Dirección de información, *Perfil de Cuba* (La Habana: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1966), 125.

²⁵ 林被甸、董經勝，《拉丁美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586。

²⁶ 袁豔，《融入與疏離：華僑華人在古巴》，頁196-197。

²⁷ Mauro García Triana, Pedro Eng Herrera, *Martí en los Chinos, Los Chinos en Martí* (La Habana: Grupo Promotor d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2003), 158-159.

²⁸ 〈絕處求生，柳暗花明：唐仲禧(Tang Chung-His)〉，載雷競濤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頁188。

²⁹ Daniel Tretiak,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7 (1961): 152.

持卡斯特羅等領導的革命活動，則很可能是革命後本地華人社團得以保留的重要誘因之一。

古巴華人社團在古巴社會主義展開初期階段，進一步受到本地社會政治結構轉型之影響，發生於1961年前後。此時古巴與蘇聯、中國大陸等社會主義國家先後建交，在冷戰對峙隔絕的大背景下，美古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⑩到1961年4月，美古兩國間已徹底斷絕正式的官方外交往來。^⑪在美國的支持與策劃下，一千餘名流亡雇傭軍從海上進攻古巴本島，引發「豬灣事件」(Invasión de Playa Girón)。^⑫事後，古巴革命政府公開宣佈古巴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並徹底從政治上轉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⑬

由於現實政治形勢的變化，豬灣事件後，卡斯特羅等人帶有「新左翼」色彩的中間路線革命理念，已無法再全然堅持，^⑭這使其加緊對古巴社會採取更具社會主義風格的建設與改造，由是也導致本地既有華人社會經濟結構開始受到較大程度的衝擊與影響。特別是古巴革命政府頒佈施行的貨幣改革、城市房屋改革、沒收25人以上外資企業與全部私有銀行等激進政策，^⑮以及加強對外匯與進口貨物的「營運管制」後，^⑯不但使本地多數華人華商受到較大打擊，部份右翼華人華商家庭為求自保，不得不開始逃離古巴；^⑰同時，部份長期依靠華商捐助與社團樓宇出租維持運營的本地華人社團也因此遭到一定程度的衝擊與影響。^⑱部份功能性較強的華人社團如中華總商會等，甚至因制度環境發生變化後，相應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而開始自行消

⑩ 李春輝、蘇振興、徐世澄主編，《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293-294。

⑪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La Havane au temps du blocus,” in *Cuba: trente ans de revolution*, ed. Maurice Lemoine (Paris: Autrement, 1988), 25-33.

⑫ Karl Meyer, Tad Szulc, *The Cuban Invasion: The Chronicle of a Disaster* (New York: Praeger, 1962), 66-67.

⑬ Clifford L. Staten, *The History of Cub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98.

⑭ 黃志良，《中拉建交紀實》（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頁33。

⑮ Martha Pon, *A Brief History of Cuba* (La Habana: Editorial Capitán San Luis, 2010), 54.

⑯ Sergio Guerra Vilaboy, Oscar Loyola Vega, *Cuba: A History* (North Melbourne: Ocean Press, 2010), 79-82.

⑰ 沃斯特著，王路沙譯，《我們的歷史並未終結——古巴革命中的三位華裔將軍》（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08），頁73。

⑱ 〈典型的華僑歲月：伍袁民(Kico One Eng)〉，載雷競璿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頁42。

亡。³⁹

當然，儘管如此，古巴華人社團卻並未因古巴革命政府相對激進的社會主義變革行動而從此一蹶不振。古巴革命政府也並未乘機對本地華人社團趕盡殺絕。之所以如是，一方面是由於古巴社會主義展開初期階段，其相關的社會變革措施雖有較為激進的面向，但卡斯特羅等人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總體看法與理解，本質上仍深受此時風行拉美地區的人道主義與「新左翼」思潮之影響。⁴⁰ 故其初期踐行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與部份東歐或亞洲式的激進社會主義有所不同，尤其在對待外僑組織的態度與政策上相對寬容。⁴¹ 同時，古巴革命政府也部份繼承西班牙殖民時代處理外僑社團的傳統，即允許外僑團體保留並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力。⁴² 革命政府在對其進行改造並加以控制的基礎上，試圖使其能夠繼續發揮「集體主義」的功能，以為社團成員謀取相應的公共福利，進而使之成為古巴式社會主義模式下兼顧民眾利益的一種表現與象徵。⁴³

此外，更為關鍵的是，1961年10月以後的一段時期內，由於蘇聯在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等問題上相對軟弱的態度，使得古巴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一度同蘇聯關係相對疏遠，而與中國大陸間外交、經貿往來不斷升溫。⁴⁴ 部份已由古巴本地左翼華人掌控的華人社團如中華總會館、民治黨支部等，與中國大陸此時往來關係較為密切。⁴⁵ 出於借助這類華人社團，發展同中國大陸間外交關係，以獲取更多中國大陸援助物資的考慮，⁴⁶ 古巴革命政府這一時期，非但未對本地華人社團採取相對激進的社會主義改造措施，反倒進一步加強對此部份華人社團的扶持與支持。古巴政府不但投入資源，修繕本地

³⁹ Mauro García Triana, Pedro Eng Herrera,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 60.

⁴⁰ 安格魯·特蘭托(Angelo Trento)著，楊曉霞譯，《卡斯特羅與古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28-29。

⁴¹ Jaime Suchlicki, *Cuba: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Washington: Pergamon Brassey, 1986), 165.

⁴² Sandra Levinson, Carol Brightman, eds., *Venceremos Brigade: Young Americans Shar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Revolutionary Cub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1), 344.

⁴³ 湯姆·海登(Tom Hayden)著，馮建三譯，《聽好了，古巴很重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81-92。

⁴⁴ William E. Ratliff, "China's new Latin-American Polic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Eastern edition), 27th August, 1971.

⁴⁵ Mauro G. García Triana, *Los chinos de Cuba y los nexos entre las dos naciones (II)*, 49-65.

⁴⁶ 湯瑪斯·E·斯吉德莫爾(Thomas E. Skidmore)等著，張森根、岳雲霞譯，《現代拉丁美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頁149。

華人公墓，重新開辦附屬於中華總會館的中華藥局等，^{④⑦} 同時在古巴外匯、外貿物資管制全面收緊，全國通行計劃經濟配給制後，經與中國大陸政府協商，古巴革命政府仍繼續允許中華總會館等華人社團發揮自主辦理寄匯、進口並分發中國貨物等職能。^{④⑧} 由此也進一步說明，卡斯特羅等人在看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問題上相對溫和的認知與態度，以及在對待處理外僑社團問題上對西班牙殖民傳統的繼承，可能是古巴嘗試探索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多數華人社團得以保存的重要動因之一。而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古兩國間的交好，則無疑是1960年代中前期古巴部份華人社團一度在本地社會主義政治形態下實現一定程度的恢復與發展的關鍵原因。

在古巴開啟對社會主義模式的探索後，本地華人社團整體處境發生較大變化，出現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1964年前後，隨着中國與蘇聯兩國關係不斷惡化，古巴無法再在社會主義陣營兩個大國間搖擺，而必須做出站隊選擇。^{④⑨} 在無法完全調節中蘇矛盾，中國方面又無力完全保護古巴並為其提供發展所需的各類援助物資的情況下，1965年3月前後，隨着古巴黨內「親中派」領袖格瓦拉(Ernesto Guevara)的出走，^{⑤⑩} 卡斯特羅等借美國入侵越南之機，重新恢復並加強與蘇聯方面因導彈危機後相對微妙的外交關係，並在中國與蘇聯間的爭論上，徹底倒向蘇聯一邊。^{⑤⑪}

此後，由於中古關係不斷交惡，古巴政府對本地華人與華人社團的態度開始逐漸強硬。非但公開沒收部份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的華人之財產，加強對本地僑匯寄返中國大陸的審查，^{⑤②} 同時還加緊對本地華人社團，尤其與中

④⑦ Yanet Jiménez Rojas, "Casino Chung Wah," Cátedra de Estudios sobr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Cuba "Las sociedades Chinas: Pasado y presente", Casa de Altos Estudios Don Fernando Ortiz (CD), 2007.

④⑧ 孫英光，〈華人在古巴〉，《炎黃春秋》，2004年，第10期，頁71。

④⑨ 朱忠祥，《我的拉美外交生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頁73。

⑤⑩ 雲水，《出使七國紀實：將軍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91-93。

⑤⑪ William E. Ratliff, "Communis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1949-1972," *Asian Survey* 12: 10 (1972): 854.

⑤② 李柏達編著，《古巴華僑銀信——李雲宏宗族家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頁178、254。事實上，古巴革命後，古巴政府一直允許本地華人每年寄返中國家鄉一定比例的僑匯，這是古巴本地華人與家鄉保持聯繫的重要方式之一。直至1994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經濟有所發展，古巴反因冷戰終結後，經濟生活水準落後於中國內地，加之華僑華人數量大量減少後，古巴政府才徹底宣佈停止本地華人向家鄉寄回僑匯〔訪談記錄：楊新新、Laura 訪談大沙華(Sagua la Grande)華裔 Fernando Wong

國大使館關係密切的中華總會館等的監控，調離部份在古巴機要與安全部門工作的華人，⁵³ 並以族裔整合為由，禁止本地華人社團公開舉辦任何與華人文化相關的各類慶典與節日活動。⁵⁴ 不難看出，1960年代中期前後，古巴在政治上徹底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後，愈發深入地捲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紛爭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蘇等大國間關係的變動，也開始成為影響本地華人社團變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上述情況以外，1960年代中期以後，對古巴本地華人社團造成的更大衝擊是，1968年前後，為表達對蘇聯在美國與越南戰爭立場上的不滿，摸索一條不同於蘇聯「正統」式社會主義的建設路徑，並達成「年產糖1,000萬噸」的目標，古巴革命政府嘗試採取更為激進的方式，對本地社會進行變革。⁵⁵ 是年3月，在卡斯特羅等人的親自動員下，古巴社會上下發起「革命攻勢」(Revolutionary Offensive)運動，全面對城市手工業與私營經濟實行「國有化改造」。⁵⁶ 運動期間，以在城市中主要從事零售業、洗衣業、小餐館經營為主的本地華人經濟受到沉重打擊，為數眾多由普通華人擁有的私營商店、手工業攤鋪等被強行納入古巴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系，華人私有經濟基礎基本被摧毀殆盡。⁵⁷ 此後，古巴革命以來主要依靠普通華人會員自願繳納會費維持運作的本地華人社團，在經費不斷減少，新會員無法補充，老會員又因中國大陸與古巴關係交惡，而不斷退出社團，甚至偷渡出逃的背景

Kwan、Ciro Wong Kwan 兄弟，2018年6月30日，Fernando Wong Kwan、Ciro Wong Kwan 兄弟家中」。除此以外，古巴革命後，本地華人与家鄉保持聯繫的另一種方式是，少數與古巴政府高層、中國大使館關係密切的華人與僑領，能夠在國際勞動節與中國國慶日等獲得返回中國觀禮觀光的机会。而冷戰結束以前，唯一從中國大陸遷往古巴的華人移民唐仲禧，便是與1972年返回中國內地參加國慶觀禮的西恩富戈斯中華會館主席胡乙富結婚後，遷往古巴定居的。又見〈絕處求生，柳暗花明：唐仲禧(Tang Chung-His)〉，頁179-183。

⁵³ Albert Manke, *Chinese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An Ethnically Marke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ologne Forum "Ethnicity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eds., Conceptualizations across Disciplines, Regions, and Periods, Transcript Verlag, 2015), 248.

⁵⁴ Carlos A. Alay Jó, "La Danza del León Chino," *Revista Fraternidad* 1: 1(2002): 8.

⁵⁵ Sergio Guerra Vilaboy, Oscar Loyola Vega, *Cuba: A History*, 91.

⁵⁶ Susan Eve Eckstein, *Back from the Futur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3.

⁵⁷ Herrera Jerez Miriam, Castillo Santana Mario, *De la Memoria a la Vida Pública: Identidades, Espacios y Jerarquías de los Chinos en la Habana Republicana (1902 - 1968)* (La Habana: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Cultura Cubana Juan Marinello, 2003), 166.

的華人社團不得不被迫停止運營，僅有為數不多條件相對較好的華人社團得以勉強保留。^{⑤③}可見，隨着古巴革命政府採取更為激進的方式探索社會主義模式，本地華人社團確也曾一度受到較為嚴重的衝擊與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巴革命後，華人社團在相對激進的本地社會主義變革的局面下，開始呈現出較之世界其他地區更為曲折複雜的變遷歷程。

1960年代中期前後，由於中古關係惡化以及古巴革命政府在探索社會主義路徑上採取更為激烈的政策和手段，在古巴政府加強監控與華人私有經濟基本被公開徹底消滅後，本地華人社團無論數量亦或會員人數等都出現大幅度的縮減。儘管如此，本地華人社團卻並未因此而完全停止活動。事實上，一方面，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後，中古兩黨、兩國關係雖不斷惡化，但畢竟此時雙方還同屬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兩國間尚存有正式的外交與外貿關係，並未徹底決裂；^{⑤④}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由於部份社團左翼華人領袖對古巴革命頗有貢獻，與古巴革命政府上層關係密切；^{⑤⑤}加之卡斯特羅等人向來在對待外僑組織等問題上態度較為寬容，其更希望保留部份華人社團，並借之為普通社團成員提供相應公共服務的同時，^{⑤⑥}另倚之加強對本地華人社區的監控。^{⑤⑦}故而，在以上動因的作用下，古巴政府並未對本地華人社團完全斬草除根，而是在加以利用的前提下，基本任其自生自滅。^{⑤⑧}

因此，1968年古巴「革命攻勢」運動後，雖有大量本地華人社團不復存在，得以殘存的華人社團諸如分享商業資訊、聯繫家鄉與在地國、延續族裔文化等功能也因時勢的變化，或逐步淡化，或基本消失，^{⑤⑨}但與此同時，卻正如部份尚健在的當地老華人對研究者所言，諸如中華總會館、民治黨支部

⑤③ 黃卓才，《古巴隨筆——追尋華人蹤跡》（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頁138、174。

⑤④ 陳久長，《卡斯特羅與古巴——出使島國見聞》，頁212。

⑤⑤ 黃卓才、莫光木，〈古巴中華總會館的命運和困惑——著名僑領周卓明先生訪談錄〉，載黃卓才、袁豔編，《從契約華工到改革先鋒：中國人抵達古巴170周年紀念文集》，頁327。

⑤⑥ Mauro García Triana, Pedro Eng Herrera,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 “Editor’s Introduction,” XX.

⑤⑦ 〈絕處求生，柳暗花明：唐仲禧（Tang Chung-His）〉，頁186-190。

⑤⑧ Jose Boltar Rodrigues, *Los Chinos de Cuba: Apuntes Etnograficos* (Habana: Fundacion Fernando Ortiz, 1997), 93.

⑤⑨ 雷競瑤，〈古巴：一頁獨特的華僑史〉，《二十一世紀》，第154期（2016年4月），頁106-107。

等具有一定歷史傳統與會員基礎的華人社團，卻仍然得以在這之後維持運營，並繼續發揮着辦理華人會員登記與老僑回國、僑匯郵寄、照顧華人鰥寡以及安排華人殯葬等事宜的功用。^{⑥5} 這也表明，即便經過較為激進的社會主義政治的改造與衝擊，古巴華人社團也因此受到較為劇烈的波動，但由於古巴革命政府始終在對待外僑組織等問題上抱持更為寬容的態度，加以其與中國大陸方面仍存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社會主義「情誼與糾葛」，^{⑥6} 使得古巴部份華人社團仍然能夠頑強保留，並維持與延續部份革命前的功能與結構；顯示古巴式社會主義激進政治形態下，本地華人社團較之其他國家與地區更為曲折與獨特的歷史命運。

二、建設與調整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時期古巴華人社團的延續與起伏

古巴華人社團在經歷古巴社會主義展開初期因激進政策帶來的嬗變與衝擊後，迎來新的局面，發生在1970年代中期。1970年，隨着古巴「年產糖1,000萬噸」運動的失敗，古巴政府不得不在經濟上對「冒進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進行調整，並進一步向蘇聯靠攏。^{⑥7} 1972年7月，古巴正式加入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在經濟上全面轉向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⑥8} 此後，因古巴在美蘇冷戰對峙格局中較為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為扶植古巴以與美國抗詬，在蘇聯與東歐各國的大力援助下，古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入所謂的「黃金期」。^{⑥9}

古巴全面依附於蘇東社會主義集團後，從1960年代末開始，貫穿至整個

⑥5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蔣祖康先生(Rolando Chiong Chang，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主席)，2018年7月5日，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會所。

⑥6 Nicola Phillips,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Dilemmas, Lowell Dittmer Dilemmas," in *China,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New Global Dynamic*, ed. George T. Yu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2010), 178-179.

⑥7 Benjamin Keen, Keith Haynes,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4), 441.

⑥8 毛相麟，〈古巴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頁34。

⑥9 Carmelo Mesa-lage, *Breve Historia Economica de la Cuba Socialist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4), 111-112.

1970年代，中國、古巴兩黨、兩國關係降至最低點。^{⑦①}而中古兩國、兩黨關係的進一步惡化，事實上也導致這一時期古巴本地華人社團的整體處境愈發艱難。正如有古巴當地華人問題研究者對作者所言，自1960年代末期，中古兩國、兩黨關係基本凍結後，不但古巴政府收緊對本地華人社團的控制，要求所有社團重新登記註冊，並將部份人數、經費不足的華人社團進行合併與裁撤。^{⑦②}隸屬於古巴安全部門的保衛革命委員會(Committe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volution, CDRs)強化對本地華人社團與中國大使館之間往來的監控，^{⑦③}中國駐古巴大使館也被迫停止與本地華人社團的公開接觸。^{⑦④}同時，在古巴高層的默許下，部份負責管理相關事務的古巴內政部官員，在處理與中國關係密切的華人社團之註冊登記等問題時，更是頗指氣使且多有刁難之舉。^{⑦⑤}因此，這一時期古巴尚存的華人社團一度面臨之政治壓力與制度環境挑戰可想而知。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於這一時期古巴全面倒向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經濟發展上出現較為繁榮的局面，^{⑦⑥}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可能因卡斯特羅等人在對待外僑組織上向來秉持相對寬和的態度與左翼人道主義立場，

^{⑦①} William E. Ratliff, "Communis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1949-1972," 847-857.

^{⑦②}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呂美枝（哈瓦那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西文秘書），2018年7月7日，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餐廳。

^{⑦③}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加西亞先生(Mauro García Triana, 前古巴駐中國臨時代辦、古巴華人研究學者)，2018年7月25日，哈瓦那雷格拉(Regla)加西亞先生宅。當然，除此以外，1960年代中期，古巴加強對中華總會館等華人社團的監控，也與1966年左右，中國國內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曾波及影響到古巴中華總會館、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等社團有關。當日在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內部「造反派」的支持下，時任中華總會館主席並兼任華僑社會主義同盟主席的呂戈子(Manuel Luis)等人，採取極端手段，以污蔑其參加過國民黨、洪門等右翼反革命組織為由，打壓與之意見相左的部份華人，引起中華總會館、華僑社會主義同盟內部華人間的派性衝突。在古巴政府的干預與監控下，呂戈子等人行動有所收斂。社團內部華人間的派性衝突，隨後也因中國國內局勢的緩和，而趨於消解。但呂戈子等人的行為，無疑招致本地不少華人的不滿與反感，呂戈子本人也不得不被迫卸去中華總會館主席等職務。此後，在中國政府的安排下，呂戈子獲得返回中國內地觀光訪問的機會，並最終在中國去世。通過此事不難看出，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也一度對本地華人社團造成過一定的衝擊與影響。囿於論題限制，此處不再贅述。相關案例分析可參見雷競璿，《遠在古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57。

^{⑦④} 朱忠祥，《我的拉美外交生涯》，頁74。

^{⑦⑤} 〈政治弄潮兒：吳帝胃(Pedro Eng Herrera)〉，載雷競璿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頁321。

^{⑦⑥} Richard Gott, *Cuba: A New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4.

經濟實力有不小提升的古巴政府通過中華總會館向尚在勉強維持運營的各華人社團劃撥一定的經費補貼，以使其能夠救濟成員中「年邁與生活困難者」。^{⑦⑥}同時，這一時期多數華人社團的普通成員在個體私人經濟被消滅，不得不轉入古巴公有制企業工作後，其收入水準與福利待遇較之國有化運動前也有不少提升與改善，^{⑦⑦}故其亦能夠向所在華人社團按時定期繳納相應的會費，以支持社團的經營與發展。^{⑦⑧}

更為關鍵的是，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在古巴整體經濟發展水準較佳的背景下，為確保古巴普通民眾能夠充份就業，共用社會主義的建設成果，古巴政府開始默許私人服務業與「平行市場」（即「議價市場」）等的存在。^{⑦⑨}據年長的地方社團領導人對研究者表示，古巴政府這一政策的實施，實際挽救了部份當日深陷經營困境的華人社團。^{⑧⑩}尤其哈瓦那以外地區部份「殘存」的地方華人社團，由於基礎薄弱、各類資源相對有限，此時多已風雨飄搖。^{⑧⑪}而古巴政府一定程度上放鬆對個體私人經濟的管控，使得這類華人社團，得以通過賄賂當地官員，獲得非制度層面開辦地下餐廳與經營黑市

⑦⑥ 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頁653。

⑦⑦ 卡梅洛·梅薩山-拉戈，〈古巴的經濟依附和對外政策〉，《拉丁美洲叢刊》，1982年，第5期，頁46。

⑦⑧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鄧小榮先生，2018年7月7日，哈瓦那華區鄧小榮先生宅。

⑦⑨ 韓琦主編，《世界現代化歷程·拉美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394。這裡所謂的平行市場或議價市場(negotiation market)，是指在古巴計劃經濟體制主導的國營市場與商店以外，與之平行存在的私人自由經濟市場。在這類市場中，買賣雙方主體不必為政府掌控的國營商店或企業，個體與私人可以在市場中自由買賣並交換各類合法商品。同時這類市場中，買賣交換的商品價格也不必遵循主管計劃經濟的政府機關強制規定的價格，可由買賣雙方自行議價協商。買賣雙方在交易完成後，僅需向管理市場的政府部門備案，並向相應的稅務機關繳納一定比例的管理費用與交易稅即可。平行市場或議價市場，常見於冷戰時期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一般是各社會主義國家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一種有力補充。從古巴的情況來看，1970年代以來，華人主要在議價市場內從事食品買賣、與農民合夥種賣蔬菜水果、維修自修車、手錶以及代人縫補衣服等工作。見魯多·曼德斯(Ludo Mendès)著，劉美安譯，《被遺忘的古巴人：臥底記者在古巴20年的生活紀實》（臺北：商周出版社，2016），頁124。

⑧⑩ 訪談記錄：楊新新、Laura González Luis 訪問 Mario Wong Gonzalez 先生（大沙華中華會館前主席），2018年6月30日，大沙華中華會館舊址。

⑧⑪ María T. Montes de Oca Choy, "Colonia China de Placetas, María Julia Martínez Alemán," in *Presencia Hispánica, Africana, China y de Otras Inmigraciones en Placetas*, eds. Lourdes Sánchez González, Maibelin Carrasco Pérez (Santa Clara: Editorial Capiro, 2000), 42.

生意等機會，⁸² 由此「度過了當時最艱難的時光」，並使得社團的狀況有所恢復與改善。⁸³

因此，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囿於古巴在建設社會主義模式上依附於蘇東集團以及中古兩國關係交惡等因素的影響，古巴政府加強對本地剩餘華人社團的監控，收回此前由本地華人社團自行辦理的華僑回國觀光探親、郵寄僑匯與獨立核算收支經費等優待政策，⁸⁴ 本地華人社團也幾乎未公開舉辦過任何與華人文化相關的活動，⁸⁵ 社團部份自治與聯繫家鄉與在地國關係等職能與功用進一步被削減與弱化。但另一方面，受益於當日古巴建設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帶來的經濟紅利，以及古巴政府部份放鬆對私人經濟的管制，古巴本地華人社團的自身經濟實力卻也因此有一定程度的恢復與提升。本地華人社團從這一時期開始基本能夠自行承擔為社團內部成員提供福利住房、免費餐食、貧困救濟以及操辦婚喪聯誼活動等服務，⁸⁶ 成為古巴華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獲取社會福利的重要路徑與依靠。

更甚者，部份諸如華僑社會主義同盟等左翼政治色彩濃鬱、與蘇聯方面關係密切的本地華人社團，在1970年代中期古巴徹底倒向並在經濟上依附於

⁸² Federico Chang,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Cuba: Asociaciones y Tradiciones,” in *De Dónde son Los Cubanos*, eds. Raimundo Gómez Navia, Graciela Chailloux (Hav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06), 40. 至於這一時期，華人社團從事的黑市生意，除經營「地下餐廳」外，也包括通過部份在國有化運動後被轉移到鄉村從事種植生產等華人群體的關係，組織倒賣較為緊俏的食品與農產品等物資。而在首都哈瓦那以外，部份管制相對不太嚴格的地區，少數華人社團甚至將社團會所改為聚會與娛樂場所，用以整體對外出租以及經營麻將、撲克等「地下娛樂活動」，以收取場地出租費與抽水桌臺費等。可見當日華人社團對非制度層面黑市生意的涉及頗廣。參見黃卓才，《古巴隨筆——追尋華人蹤跡》，頁175。

⁸³ 訪談記錄：楊新新、Laura González Luis 訪問 Mario Wong Gonzalez 先生，2018年6月30日，大沙華中華會館舊址。

⁸⁴ 黃卓才，《鴻雁飛越加勒比——古巴華僑家書紀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頁342。

⁸⁵ Adrian H. Hearn, *Diaspora and Trust: Cuba, 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 117.

⁸⁶ 訪談記錄：楊新新、李柏達訪問楊開健先生（謝戈德阿拉維民治黨支部前主席），2018年6月30日，謝戈德阿拉維民治黨支部會所。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由於部份年歲較長的華人鰥寡去世後，其喪葬後事等基本由華人社團出面協調解決。他們所遺留的財產，為免被古巴政府所徵收，除部份用於開支辦理喪葬等費用，部份按照古巴政府相關規定按比例折價匯寄給中國內地的親人好友外，剩餘部份則一般成為其生前所在社團的重要收支來源之一，用於社團為會員等提供各項公共福利的花銷。又見黃卓才，《鴻雁飛越加勒比——古巴華僑家書紀事》，頁349-352。

蘇聯後，不但古巴政府對其給予較為充足的經費補貼，社團會員人數多有增加，⁸⁷ 此前因族裔整合政策與經費緊缺而被迫停辦的中文補習教育與「革命樣板戲表演」等文藝活動也得以在社團內部重新悄然舉行，古巴政府對此基本持默許態度。此外，古巴政府允許其以低價向華人銷售由中國等地批發進口而來的藥品、醬油等緊缺品。⁸⁸ 同時，由於古巴政府為利用華僑社會主義同盟等發展與蘇聯及東歐各國的關係，此類社團中部份成員也通過蘇聯以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資助與邀請，獲得前往蘇聯、東歐各國觀光、留學，甚至返回中國內地參加國慶觀禮的機會。⁸⁹ 由此也顯示這一時期部份古巴華人社團在古巴建設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的路徑下，並未如前人所言全然走向末路，反而一定程度上充滿生機與活力。

在古巴建設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的背景下，本地華人社團整體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新變化，則發生在1980年代以後。一方面，1980年代中期蘇聯新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上臺後，提出「新思維」戰略，收緊對古巴的實質性援助，⁹⁰ 促使卡斯特羅與古巴方面開始對建設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模式進行反思並做出部份調整，與蘇聯關係發生微妙變化。⁹¹ 另一方面，隨着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部份緩和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間的緊張對峙關係，古巴方面主動修復並擴大與中國間的經貿外交往來，中古兩國關係開始有所復蘇。⁹²

在上述內外條件變化的影響下，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古巴政府不但逐步調整此前在對待本地華人問題上長期堅持的族裔整合政策，開始公開承認華人文化作為古巴民族文化中的一項重要族裔文化資源的作用與地位，⁹³ 還默

⁸⁷ Mercedes Tania Crespo Villate, "Allanza Socialista China de Cuba," Cátedra de Estudios sobr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Cuba "Las sociedades Chinas: Pasado y presente", Casa de Altos Estudios Don Fernando Ortiz (CD), 2007.

⁸⁸ 黃卓才、莫光木，〈古巴中華總會館的命運和困惑——著名僑領周卓明先生訪談錄〉，頁319-320。

⁸⁹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 Alfredo Fong J6 先生（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2018年7月7日，哈瓦那中華總會館。

⁹⁰ 蔡同昌、江振鵬，〈蘇聯（俄羅斯）與古巴關係的演進〉，《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5期，頁41。

⁹¹ 李春輝、蘇振興、徐世澄主編，《拉丁美洲史稿·下卷》，頁316。

⁹² Frank O. Mora,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1977-1997,"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41: 2 (1999): 98.

⁹³ Jesús Guanche, *Procesos etnoculturales de Cuba* (La Habana: Editorial Letras Cubanas, 1983), 2-3.

許華人社團重新公開舉辦華人節日慶典、為社團成員播放由中國大使館提供的電影、電視等文化節目。^{⑨④} 同時，針對本地華人社團成員中年老者不斷增加的新情況，古巴政府也重新允許其中有能力者自費返回中國探親或定居，^{⑨⑤} 並另撥專門經費，修繕頤僑院、華人公墓等福利贍養機構，交由相關華人社團自主打理，以作照顧華僑華人中年老力衰者所用。^{⑨⑥} 由是，此前本地華人社團部份喪失的自治與聯繫家鄉與在地國關係、延續族裔文化等職能與功用得以逐步恢復。

此外，更為關鍵的是，在1986年古共「三大」，古巴開啟糾正經濟領域「錯誤和消極傾向進程」，^{⑨⑦} 取消農民自由市場和私人個體經濟的背景之下，^{⑨⑧} 古巴政府此時非但未對本地部份華人社團業已存在的各類非制度經濟進行打壓與取締，反倒還公開向相關社團發回之前收回的部份房產以及獨立核算收支經費等權力，^{⑨⑨} 並默許哈瓦那以及部份地方華人社團以「集體經濟」的名義公開經營小型餐廳，以增加社團收入、維持社團經營，並為社團成員謀取相應的福利。^{⑩⑩}

由此可見，至少從1970年代中前期古巴效法蘇聯建設「正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開始，到1980年代中期古巴方面對這一模式作出部份調整前後，古巴華人社團的部份結構與功能確曾一度因制度環境的變化，而受到較大程度的削減與弱化。不過，由於受益於古巴建設「正統」式社會主義路徑模式下，因蘇聯等外來援助帶來的良好的經濟發展水準，這一時期古巴華人社團不但在經濟層面上總體能夠維持經營並有所發展，成為其時社團成員獲取相關公共福利的重要來源與依靠，而且隨着蘇古、中古關係的微妙變化以及古巴政府對「正統」社會主義模式的不斷修正與調整，本地華人社團亦不斷獲益，開始逐步恢復此前被弱化的自治、聯絡家鄉與在地國關係、延續族裔文

⑨④ Carlos A. Alay J6, Julio G. Hun Calzadilla, *La Danza del León Chino en Cuba* (La Habana: Ediciones extramuros, 2015).

⑨⑤ 〈人在天涯，隨遇而安：沈傑林(Julian Antonio Eng)〉，載雷競璿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頁167。

⑨⑥ Julio G. Hun Calzadilla, “Las Sociedades Chinas en Cuba, Escudo y Sostén, Cultura y Tradición,” *Revista Fraternidad* 2: 2 (2003): 12.

⑨⑦ 毛相麟，《古巴社會主義研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頁152。

⑨⑧ Sergio Guerra Vilaboy, Oscar Loyola Vega, *Cuba: A History*, 100.

⑨⑨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劉淑芬女士（哈瓦那龍崗公所主席），2018年7月17日，哈瓦那龍崗公所辦公室。

⑩⑩ 〈人在天涯，隨遇而安：沈傑林(Julian Antonio Eng)〉，頁167。

化等功能，顯示本地華人社團在古巴建設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制度夾縫下的韌性與頑強生命力。

當然，儘管1980年代以來，由於各方面條件的變化，在古巴調整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模式的進程中，本地華人社團的部份功能與結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與發展，但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本地華人社團因1970年代以來經濟繁榮而被掩蓋的部份問題也開始不斷顯現。如前文所言，古巴革命後，由於古巴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華人新移民遷入古巴進程被迫中斷，加之國有化運動與族裔整合政策推行後，本地華人社團無論數量或會員人數都與日遞減。^⑩ 到1980年代前後，隨着多數尚存之社團會員年歲漸長，辭世者日漸增多，部份華人社團，尤其哈瓦那以外地方華人社團，會員人數已無法達到古巴社團法規定的註冊要求而被迫停止運營。^⑪ 部份哈瓦那地區的姓氏類或地域類華人社團，則不得不通過接納本地出生的「土生唐人仔（華裔）」與兼收其他社團成員的加入，方能完成登記註冊。^⑫ 據哈瓦那中華總會館統計，截止1986年底，全古巴境內僅有不到20家華人社團尚在維持運作，而所有登記之華人社團會員中出生地為中國者，已不足千人。^⑬

除此以外，對於這一時期的古巴華人社團而言，更為麻煩的是，社團成員中年長者不斷增加，社團贍養年老會員之開支也不斷攀升。雖然有社團餐廳收入與古巴政府予以相應的補貼，但此時社團會員人數不斷減少，相應會費的繳納亦呈現出日朘月削之勢，部份社團甚至已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⑭ 為解決這一問題，在古巴政府的默許與支持下，哈瓦那中華總會館不得不做出統一強制規定，要求各社團有合法收入與退休金之會員，每年必須向社團繳納一定數額之會員費，方可享受社團提供之各類福利。^⑮ 因此，古巴建設並調整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時期，華人社團雖因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紅利而受益，但由於此前制度環境的變化，導致一段時期華人新移民無法再遷

^⑩ Alberto Consuegra Sanfiel, "Las sociedades chinas de La Habana. Una mirada histórica desde el presente," 75-76.

^⑪ 訪談記錄：楊新新、Laura González Luis 訪談卡馬圭 (Camagüey) 華裔姐妹 Laylio Fong Ramirez、Chukian Fong Ramirez，2018年7月2日，卡馬圭中華會館舊址。

^⑫ 〈一歲到古巴，晚歲復歸華區：黃念錦 (Adelaida Wong Lui)〉，載雷競瑋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頁201。

^⑬ Adrian H. Hearn, *Diaspora and Trust: Cuba, 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 100.

^⑭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談劉淑芬女士，2018年7月17日，哈瓦那龍崗公所辦公室。

^⑮ 陳久長，《卡斯特羅與古巴——出使島國見聞》，頁247。

入，華人社團成員人數不斷遞減與年長者不斷遞增，成為此一時期古巴華人社團相關新問題產生的重要誘因之一。而這也從另一面顯示本地華人社團在古巴社會主義制度下較之別處相對獨特的歷史變遷軌跡。

三、社會主義「和平特殊階段」華人社團的復興與發展

就古巴本地華人社團而言，其在古巴社會主義制度下，顯示出較大程度的新變化，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以後。1990年代初，隨着冷戰終結、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解體，此前長期在經濟上效法蘇聯模式並依靠蘇東各國援助的古巴由此陷入空前的困境。^⑩為應對內外嚴峻形勢帶來的危機與挑戰，卡斯特羅在宣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變的原則下，提出古巴進入社會主義「平時特殊階段」，決定對此前長期奉行的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進行較大幅度的變革與調整。^⑪古巴政府在放寬對外資投資限制的同時，開始重新公開允許個體私營經濟與有限度市場經濟的存在，^⑫並對國民產業經濟結構做出重新規劃，大力扶植旅遊業、外貿進出口業等的發展，以爭取更多外匯與必要的食品及輕工業產品，使國家經濟能夠度過難關。^⑬

此後，受益於上述政策帶來的新變化，不但部份擁有較為豐富「非制度與個體經濟」經驗的華人社團成員，得以通過此前積累的社會人脈與基礎，在制度性正式工作以外合法從事食品商品倒賣、翻譯、導遊等「第二職業」，獲得相應的額外收入，以改善個人生活困境，減輕華人社團的福利負擔；^⑭同時，到1995年卡斯特羅訪問中國前後，出於發展哈瓦那觀光旅遊業、加強同中國間外交與經貿合作的考慮，古巴政府更是在卡斯特羅本人的

⑩ Salim Lamrani, *The Economic War against Cuba: A Histor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U. S. Blocka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32.

⑪ 毛相麟，〈蘇東劇變後古巴的形勢及內外政策〉，《拉丁美洲研究》，1996年，第5期，頁19-23。

⑫ 毛相麟，〈古巴為生存和發展而鬥爭〉，《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3年，第1期，頁36。

⑬ 李同成、黃士康主編，《中國外交官在拉丁美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294。

⑭ 〈現代遺民，海隅餘生：周柏圖（Felipe）〉，載雷競璿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頁159-161。

親自授意下，從有限的經費中撥出專款，對哈瓦那華區進行翻新與整治，^⑪並根據華裔將軍邵黃(Moises Sio Wong)等人的建議，成立由本地華人負責、隸屬古巴司法部的半官方機構哈瓦那華區促進委員會(Grupo Promotor d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以下簡稱華區促進會)，^⑫發回多數被古巴本地人佔據的華人社團房產，^⑬給予尚存的各華人社團相應的政策優待，並對各華人社團進行指導與管理。^⑭

事實上，據見證過並熟悉華區促進會情況的古巴當地中國新移民向研究者介紹，華區促進會成立後，古巴政府一方面希圖借華區促進會、各華人社團與中國大陸間天然的族裔資本優勢，同意各華人社團在華區促進會的指導下，以「集體經濟」的形式建立自「革命攻勢」以來古巴首批公開合法的自由經營商店與市場，並授予其直接從中國進口食品與輕工業消費品進行批發銷售的權力，以增加政府稅收，緩解本地物資緊張的困局；^⑮另一方面，為減輕政府對各華人社團的財政負擔，古巴政府又特許本地華人社團不受相關法令限制，擴大所屬餐廳經營規模，^⑯以提高社團自主經濟收入，並將社團運營餐廳與商店等所獲之利潤，用於安排老僑返回中國定居、接濟社團中老

^⑪ Yrmina G. Eng Menéndez, *Etnicidad y Autorecuperación: La Comunidad China en Cuba y 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manuscript, December 2004. 事實上，早自1989年前後，預感到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未來可能會出現問題後，古巴政府為向中國方面進一步「示好」，以作將來之「未雨綢繆」計，卡斯特羅本人不但在時隔二十餘年後，重新親自視察哈瓦那華區，向隨行電視臺等新聞單位記者暢談「古中友誼」，還決定由古巴政府出資，開始對哈瓦那華區進行修繕。見高偉濃，《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下冊）》，頁107。

^⑫ Luis Báez, *Secreto de Generals* (Habana: Si-Mar, 1996), 419-430.

^⑬ Julio Gerardo Hun Calzadilla, *Pensar el Barrio Chino: Crónicas de Una Presencia*, 82-88.

^⑭ Yrmina G. Eng Menéndez, *Etnicidad y Autorecuperación: La Comunidad China en Cuba y 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古巴政府成立「哈瓦那華區促進委員會」後，華區促進會隸屬古巴官方機構哈瓦那城市歷史學家辦公室(Oficina del Historiador de la Ciudad Habana)領導。華區促進會負責人一般由古巴政府任命與各華人社團關係密切、在古巴華人社團中擁有一定威望且具有華人血統者擔任。華區促進會的工作人員，則由古巴政府雇傭招募，但多數具有華人血統，或從事過與華人相關的工作。見周莉，〈古巴華社掠影〉，頁42-43；Adrian H. Hearn, *Diaspora and Trust: Cuba, 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 119-120.

^⑮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韓慶山先生，2019年7月5日，哈瓦那 La Terraza 餐廳。

^⑯ 按照「和平時期特殊階段」古巴政府允許個體私人經濟存在的《第141號法令》規定，非國營性質的餐廳，最大經營規模只能擁有三張餐桌與12把座椅。但古巴華人社團所屬餐廳，因其屬「集體經營」與福利機構的性質，則可不受此法令限制。

年貧困者與補貼頤僑院、華人公墓等福利機構的開支。^{⑪⑧} 由此可見，古巴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隨着內外環境的整體變動，本地華人社團不但成為這一時期古巴華人華裔在經濟上「克服時艱」的重要依靠與保障，同時也對古巴社會整體上走出冷戰以後的極端困難局面多有裨益。

當然，古巴華人社團在古巴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除經濟層面上有所進展外，其另一大變化是，隨着冷戰終結後，中古兩國關係重新修好以及古巴社會再次開放，本地華人社團不但公開恢復與中國政府以及中國駐古巴大使館的直接聯繫，^{⑪⑨} 而且部份姓氏宗親社團亦與相應之世界性華人社團聯誼組織建立起聯繫。^{⑪⑩} 在中國大使館與相應社團聯誼組織的幫扶下，本地華人社團不但重新公開恢復《光華報》、金鷹戲院等附屬文化機構的活動，^{⑪⑪} 開辦中文普通話學習班，^{⑪⑫} 並從中國廣東等地請來「師傅」，開設武術與太極拳等課程。^{⑪⑬} 同時，為發展華區旅遊、增進古中友誼，在古巴旅遊文化部門、古中友好協會與華區促進會等的支持下，依託中華總會館、洪門民治黨支部等華人社團組織，哈瓦那華區另成立中國藝術與傳統會(Casa de Artes y Tradiciones China)，積極展開對古巴華人文化的研究，並公開舉辦諸如「紀念華人抵達古巴100周年」、「古巴華人文物展覽」、「古巴華人歷史報告會」、「華人書畫美術展覽」、「中國電影週」等慶典與文化活動。^{⑪⑭} 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古巴華人社團聯繫家鄉與在地國、延續族裔文化等功能也得到較大程度的復興與發展，^{⑪⑮} 表明古巴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的本地華人社團，非但未同古巴社會一道整體上陷入危機與衰敗之中，反倒借內外條件變化帶來的新優勢，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欣欣向榮之色，

⑪⑧ Kathleen Maria López, “The Revitalization of Havana’s Chinatown: Invoking Chinese Cuban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 1 (2009): 177-200.

⑪⑨ Jesús Guanche, *Presencia China en Cuba* (Habana: Grupo Promotor d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1999), 1.

⑪⑩ 〈古巴龍崗親義總公所現況〉，《世界龍崗會訊》，第19期（2013年8月），頁3。

⑪⑪ Yanet Jiménez Rojas, “El Periódico chino Kwong Wah Po,” Cátedra de Estudios sobr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Cuba “Las sociedades Chinas: Pasado y presente”, Casa de Altos Estudios Don Fernando Ortiz (CD), 2007.

⑪⑫ *Escuelas en el Barrio Chino*, Habana, manuscript, 2004.

⑪⑬ Carlos A. Alay Jó, “El Kung Fu en Cuba,” *Revista Fraternidad* 1: 1(2002).

⑪⑭ Jesús Guanche, *Presencia China en Cuba*, 1.

⑪⑮ Yrmina Gloria Eng Menéndez 著，吳茜譯，〈身份認同與文化對話：華裔古巴人與古巴華人〉，載黃卓才、袁豔編，《從契約華工到改革先鋒：中國人抵達古巴170周年紀念文集》，頁114。

顯示古巴華人社團命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吊詭與複雜。

不過，儘管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古巴華人社團總體發展勢頭良好，但也正如一位不願公開姓名、對華區促進會內幕頗為了解的當地華裔官員私下對研究者所坦言，這一時期無論華區促進會或本地華人社團其實也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華區促進會成立後，古巴政府通過華區促進會給予各華人社團相應的進出口批發銷售特權，使得華區促進會部份官員與各華人社團領袖之權力不斷擴大，但相應的監督管理機制卻並未建立與完善。部份華區促進會官員與華人社團領袖，為謀取個人利益，乘機利用此時華區促進會與華人社團制度不完備的漏洞，同部份風聞古巴商機而來的中國中間商相互勾結，大肆從事走私與黑市貿易等活動，導致華區地下非法經濟異常發達，華區促進會、各華人社團內部貪腐與貧富分化等問題日益顯著。¹²⁶ 部份社團甚至一度出現因利益分配不均而被迫暫停運營等情況，¹²⁷ 反映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古巴華人社團一定程度上的混亂與失序。

由於聲名不佳，哈瓦那華區與華人社團的上述亂象，很快也引起古巴政府的關注與警惕。從1997年底開始，在古巴本地經濟有所恢復後，¹²⁸ 古巴政府便着手對這類問題進行初步整治。為避免華區促進會的華人華裔官員利用制度漏洞與「族裔信任資本」夥同華人社團領袖、中國貿易商等狼狽為奸、墮落腐化，古巴政府開始任命與華人社團領袖、中國中間商關係較為疏遠的土生古巴裔官員取代華裔官員擔任華區促進會領導，並要求古巴司法部、哈瓦那市政府等單位加強對華區促進會、各華人社團的財務監督與審計。¹²⁹ 不過，鑒於當日古巴經濟總體上尚未全然恢復元氣，加以顧及與中國的外交經貿關係，古巴政府上述整治措施之執行與效果一直不溫不火。¹³⁰ 直至2005年前後，卡斯特羅宣佈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結束，古巴社會經濟步入發展正軌後，古巴政府才決定徹底解決華區促進會與華人社團的混亂問題。

從2005年底開始，古巴政府不但撤銷與各華人社團、中國貿易商間頗有

¹²⁶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古巴華裔官員，2018年7月19日，哈瓦那 Meliá Cohiba Hotel。

¹²⁷ 徐仲熙，《美洲與泰國近代華僑血淚史》（曼谷：泰中學會，2002），頁86。

¹²⁸ 徐世澄，〈從古共五大看古巴經濟政治形勢〉，《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頁5。

¹²⁹ Adrian H. Hearn, *Diaspora and Trust: Cuba, 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 120-121.

¹³⁰ 高偉濃，《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下冊）》，頁107。

經濟利益糾葛，^⑬且有成為古巴「地下非制度經濟大本營」趨勢的半官方機構華區促進會，代之以直接向古共中央政治局負責、此前一直領導華區促進會的哈瓦那城市歷史學家辦公室（Oficina del Historiador de la Ciudad Habana，以下簡稱歷史學家辦公室），對華區與各華人社團進行直接監督與領導；^⑭同時，接手華區促進會工作的歷史學家辦公室，又根據古巴司法部等政府機構的指示，加強對本地華人社團財務與稅收的監管與審查，沒收部份有違規經營嫌疑的華人社團下屬餐廳與商店的營業牌照，凍結部份偷稅漏稅嚴重的華人社團的銀行帳戶，查處並逮捕部份貪污腐化嚴重的前華區促進會官員與華人社團領袖。^⑮由此，本地華人社團自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以來亂象叢生的弊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然而也正是因為古巴華人社團的上述混亂問題受到相應的限制與打壓，導致古巴華人社團此時經濟上方興未艾的良好局勢遭到較大程度的衝擊與影響，顯示了本地華人社團在古巴社會主義「和平時期特殊階段」命運的跌宕起伏。

四、社會主義「更新」時期古巴華人社團的新變化與未來趨勢

「和平時期特殊階段」結束後，古巴華人社團在本地社會主義制度下出現新的變動，與古巴社會主義建設整體進入「更新」（Actualizar）時期有關。2008年前後，對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政策頗為傾心的勞爾·

^⑬ 此外，據知情人士向研究者透露，古巴政府下定決心撤銷華區促進會的另一大不便明說的動因是，1995年華區促進會成立後，中國政府尤其中國駐古巴大使館積極借助「族裔信任資本」與當日華區在古巴國內的相對特殊地位，插手華區與各華人社團的相關事務，有意無意間左右並控制華區促進會，使得哈瓦那華區與華人社團一度成為古巴的「法外之地」。而部份華區促進會官員與社團領導則借中國大使館的暗中支援，以黑社會組織等形式，掌握華區與各華人社團各種生意的經營大權，這也引發古巴政府的強烈不滿。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古巴華區促進會知情人士，2018年7月24日，哈瓦那 Meliá Cohiba Hotel。

^⑭ Casa de Altos Estudios Don Fernando Ortiz, *Las Sociedades Chinas en Cuba: Pasado y Presente* (La Habana: Editorial Imagen Contemporánea, 2007), 2. 哈瓦那城市歷史學家辦公室目前除有監督領導華人社團的職能外，主要負責哈瓦那老城區文化遺產管理，並進行旅遊試點開發與開放等工作，以實現文物保護和經濟盈利上的雙贏效益。又見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朱霖先生，2018年4月13日，北京麥當勞復興門餐廳。

^⑮ 〈當過民兵，上過前線，監視過華僑：余景暖（León Yi）〉，載雷競濤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頁225、228。

卡斯特羅(Raúl Modesto Castro Ruz)接替兄長菲德爾·卡斯特羅正式執政，^⑬他提出要大幅度改革並調整古巴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並加快古巴的對外開放進程，此後，古巴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所謂的「更新」時期。^⑭由於古巴進入社會主義「更新」時期後，古巴政府進一步放寬對本國私人經濟與外國投資等的限制，^⑮這一方面無疑使得「和平時期特殊階段」古巴華人社團經濟層面上獲得的制度與政策優勢開始逐漸喪失，部份不善經營的華人社團，面臨着來自古巴本地其他私人餐廳與個體商店等的衝擊。^⑯古巴華人社團內部，因領袖與運營能力高低差距，引起的分化與差異加劇等問題開始顯現。^⑰但另一方面，因為古巴政府上述舉措的有力推行，使得部份中國企業與商人得以開始有規模地湧入古巴市場，^⑱為本地部份華人社團帶來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

據了解古巴當地中國企業與商人的知情人士對研究者透露，2008年以來，隨着古巴市場的日漸放開，為尋覓商機、規避古巴當地相對特殊的市場環境帶來的風險與制度限制，進軍古巴市場的中國企業與部份中國商人一度積極利用「族裔信任資本」的優勢，通過經濟贊助、投資入股等形式，主動與部份有一定實力且由能力較強的領導者掌控之本地華人社團積極展開合作。^⑲他們借古巴相關經濟政策再次變化調整的機會，在經濟上為本地部份華人社團重新帶來利好的同時，也使得此前已被古巴政府部份遏制的非法走私、地下黑市經濟等問題在華區與華人社團中死灰復燃，^⑳並進一步加劇不

^⑬ Domingo Amuchastegui, *Cuba's Armed Forces: Power and Reforms*, University of Miami, the Cuba Transition Project, 2003, 113-114.

^⑭ 徐世澄，〈古共「六大」與古巴經濟模式的「更新」〉，《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3期，頁14-19。

^⑮ 徐世澄，〈從古共六大到古共七大：古巴社會主義模式的更新〉，《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5期，頁2-13。

^⑯ 訪談記錄：楊新新、李柏達訪問鄭啟巨集，2018年7月6日，哈瓦那中華總會館。

^⑰ 〈古巴大爺：伍迎創(Juan Eng Jong)〉，載雷競濤編，《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頁37-38。

^⑱ Adrian H. Hearn, *Cuba and China: Less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d report for the CubaInfo Series, The Cuban Research Institute,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une 2009, 1-7.

^⑲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朱霖先生，2018年4月13日，北京麥當勞復興門餐廳。

^⑳ Archibald Ritter, "El VI congreso del partido y los lineamientos: Un punto de viraje para Cuba?" *Espacio Laical* 3 (2011): 20.

同華人社團間經濟層面上的分化與差異。^⑭ 這表明古巴社會主義「更新」時期以來，古巴社會因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加速造成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與非制度經濟大量存在等問題，同樣也在本地華人社團的發展變遷歷程中得到體現與反映。

而出於調整與完善「更新」發展模式，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必要的公平與正義，在古巴政府的授意與默許下，為繼續應對並解決華人社團上述重新出現的弊病，從2009年前後開始，負責指導管理哈瓦那等地華人社團的歷史學家辦公室不但再次加強對本地華人社團財務上的監管與控制，要求各華人社團的經濟發展與財務收支須更具透明性，^⑮ 而且收回此前由古巴政府授予各華人社團直接進出口批發銷售中國商品的特權，規定各華人社團及其所屬餐廳與商店此後禁止以任何形式參與同中國官方、民間的直接經貿往來活動，並公開明確華人社團及其所屬餐廳、商店作為為本族裔群體謀取福利而非商業機構的性質。^⑯ 此外，為進一步收緊對各華人社團在經濟上的管制，歷史學家辦公室還大幅度提高徵收華人社團所屬餐廳、商店等的稅收比例，並繞開各華人社團，在華區中建立起直接由其領導負責，享受相應稅收與商品進口等優待政策的「華人示範餐廳與商店」，以與各華人社團所屬的餐廳、商店進行直接競爭。^⑰

據古巴當地相關人士向研究者透露，由於歷史學家辦公室上述一系列較大幅度的政策調整與做法，極大地損害本地多數華人社團的利益，加之在對華人社團經濟活動的「整治」行動中，歷史學家辦公室相關官員亦不乏貪腐與權力尋租等行為，且其以發展旅遊觀光為目的的「華人社團遺產開發計劃」因對本地華人社會歷史文化缺乏相應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傷害了各華人社團的傳統與眾多社團普通成員的福利待遇，故而歷史學家辦公室的上述舉措激起各華人社團的普遍不滿與反對，甚至一度引發四十餘名華人社團領袖與餐廳經理人公開前往歷史學家辦公室進行抗議的衝突事件。^⑱

在意識到歷史學家辦公室對華人社團的打壓政策可能會導致其與各社團

^⑭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鄧小榮先生，2018年7月7日，哈瓦那華區鄧小榮先生宅。

^⑮ Adrian H. Hearn, *Diaspora and Trust: Cuba, 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 145.

^⑯ Casa de Altos Estudios Don Fernando Ortiz, *Las Sociedades Chinas en Cuba: Pasado y Presente*, 18.

^⑰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朱霖先生，2018年4月13日，北京麥當勞復興門餐廳。

^⑱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陳秀梅女士（哈瓦那來來中餐廳老闆），2018年7月26日，哈瓦那來來中餐廳。

間的對峙衝突有進一步升級的趨勢後，基於華人社團及其所屬餐廳、商店不但一定程度上已成為古巴社會「更新」開放的象徵，且亦是古巴社會經濟結構中，尤其是首都哈瓦那旅遊觀光業與服務業中的一股重要力量；^⑭ 加之考慮到維持與中國間的外交經貿關係，^⑮ 以及顧及到社會主義「更新」時期解決華人社團中眾多普通會員的社會福利問題仍需主要依靠本地華人社團展開，^⑯ 向來對待外僑社團組織較為寬容的古巴政府，在部份與勞爾等古巴政府高層私人關係密切的華人華裔領袖的斡旋下，決定對兩方間的衝突採取折中妥協的處理辦法。

一方面，古巴政府進一步明文規定華人社團作為族裔福利機構的性質，禁止其與中國企業及商人有任何商貿往來活動的前提下，將與各華人社團關係緊張且有貪腐行為的土生古巴裔官員調離歷史學家辦公室，停辦尤其為各華人社團所不滿的「華人示範餐廳」，並以歷史學家辦公室的名義撥出相關經費，翻新並重建中華藥局，恢復《光華報》的出版，以緩和雙方間的對立關係。^⑰ 另一方面，古巴政府又以歷史學家辦公室的名義公開表態，未來任何針對本地華人社團的發展計劃，都將事先徵求本地社團的意見，並將中華總會館由此前作為與各華人社團「平行」的獨立社團組織，改為帶有半官方色彩的「社團聯合會」，在總會館內部成立由各華人社團主席擔任委員的執委會，以作為緩衝歷史學家辦公室與各華人社團間關係的協調機構，在雙方遇有較大分歧與對峙時，發揮居中調節的功用。^⑱

通過古巴政府的上述調整措施不難看出，古巴社會主義「更新」時期，經過「和平時期特殊階段」的復興與發展後，在古巴社會主義制度愈發開放的大背景下，擁有一定實力與影響力的本地華人社團，不但已成為古巴社會經濟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勢力，且已能夠為維護與爭取自身利益，直接參與到本地公共政治事務的博弈與競爭之中，並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而這無疑顯示在古巴社會主義制度整體「更新」的新局面下，華人社團作為外

^⑭ Carlos A. Alay J6, *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Un Producto Turístico*, Ponencia presentada al V Festival de Chinos de Ultramar, Ciudad de La Habana, Cuba, Mayo 2002.

^⑮ Bernadett Lehocski, "Sino-Cub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ban Studies* 4: 3/4 (2012): 299-300.

^⑯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陳秀蓮（哈瓦那中山自治公所主席），2018年7月19日，哈瓦那新城陳秀蓮家中。

^⑰ Adrian H. Hearn, *Diaspora and Trust: Cuba, 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 151-153.

^⑱ 黃卓才，莫光木，〈古巴中華總會館的命運和困惑——著名僑領周卓明先生訪談錄〉，頁327。

僑組織此前遭到限制的自治與獨立等特性，也得到較大程度的恢復與發展。

除以上情況外，社會主義「更新」時期，古巴本地華人社團出現的其他新變化是，如前文所言，隨着古巴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本地中國投資與中國新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加以自2006年以來，為償還拖欠中國方面的債務，古巴政府決定五年內為兩千餘名中國中西部地區高中畢業生提供免費赴古巴留學的機會。^⑮這使得自古巴革命以來，華人新移民被迫停止遷入古巴的局面被打破。據相關士人向研究者透露，隨着中國新移民，尤其中國留學生的大規模到來，他們中部份人以各種形式與本地華人社團積極展開經濟層面上的合作，並主動參與本地華人社團舉辦的各類文教活動，^⑯甚至有少數留學生因與部份社團領袖、經理有較為密切的生意往來，已被「秘密吸納為本地華人社團的成員」。^⑰無疑，這些新移民與留學生的到來，為以華裔居多、華僑華人所剩無幾的本地華人社團的發展注入新活力。但與此同時，其與華人社團間的秘密生意往來，卻也一定程度上使得華區與華人社團長期存在的非制度經濟發達等頑疾始終存在。

此外，由於近年來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府加強對海外各華人社團的統戰與聯誼工作。在中古兩國關係日熾，古巴社會主義開放「更新」的大背景下，^⑱中國各級政府，尤其與古巴華人華裔鄉誼情義濃厚的廣東等地政府，不但為本地華人社團修繕重建中華藥局、頤僑院、《光華日報》社等文化福利機構以及舉辦各類中華文化慶典活動提供相應的捐贈與

^⑮ Cheng Yinghong, "The 'Socialist Other': Cuba in Chinese Ideological Debates since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209: 1 (2012): 210-212.

^⑯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陶炎（哈瓦那天壇餐廳老闆），2018年7月7日，哈瓦那天壇餐廳。

^⑰ 之所以稱之為「秘密吸納」，主要因為根據目前古巴對華人社團的相關規定，社團只能吸收古巴本地出生的二代、三代華裔加入。對於中國新移民加入既有華人社團，目前古巴尚無相關的政策與法律，且古巴政府曾明確表示，拒絕定居古巴的中國新移民成立新的社團組織。此外，據當地中國新移民對研究者表示，本地華人社團不願意接納中國新移民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部份當地社團領導人認為，本地華人社團資源有限，中國新移民的加入不但可能分走本地華人華裔為數不多的公共福利，且部份中國新移民加入社團主要意在藉加入社團的名義，從事非制度性商貿往來生意，目的與動機不純，可能再次影響到古巴政府對華人社團的政策與態度。參見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陳秀梅女士，2018年7月26日，哈瓦那來來中餐廳；黃卓才、莫光木，〈古巴中華總會館的命運和困惑——著名僑領周卓明先生訪談錄〉，頁329。

^⑱ Dosch Jorn, David S. G. Goodma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Complementarily, Competition, and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1: 1 (2012): 3.

支持，^⑮同時中國官方各類外事僑務機構也積極通過各種管道，安排本地華人社團僑領與老僑等返回中國觀光探親。^⑯故而，總體觀之，本地華人社團在古巴社會主義「更新」時期，延續族裔文化、聯繫家鄉與在地國等功能結構也得到進一步的復興與強化。

不過，雖然受益於近年來內外形勢條件的變化，「更新」時期的古巴華人社團，無論經濟政治層面，亦或文化與社會功能等面向上，較之從前總體而言皆有了蒸蒸日上之勢；但古巴社會主義「更新」模式下，本地華人社團仍存在着不少新問題。一方面，正如有古巴當地華人社團領袖向研究者坦言，由於較之世界其他地區，古巴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總體上仍較為落後，「更新」開放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⑰加之經歷古巴革命以來長期的封閉與隔絕後，本地華人華裔人口數量有限，華人社團成員中尤以在古巴本地出生的二代、三代華裔為主，^⑱故而比之世界其他地區，目前古巴華人社團整體會員數量與組織規模不大，華人華裔融入當地社會程度與社團當地語系化色彩較高。在目前全球化的新時代背景下，雖然其依舊發揮着為本地華人華裔謀取福利以及維持華人社區族裔文化延續等功能，但無論其組織結構水準，抑或參與跨國主義活動之頻率與進程，仍不可與古巴革命前之境況同日而語，亦無法同發達國家地區乃至部份發展中國家地區之華人社團相提並論。

而另一方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和平時期特殊階段」與「更新」時期，由於中國投資、中國新移民與留學生主要集中於哈瓦那地區，古巴政府給予本地華人社團的優待政策，也主要針對哈瓦那華區的華人社團。故而，因古巴社會主義制度「更新」改革而受益的華人社團都主要集中於哈瓦那地區。^⑲至於哈瓦那以外地區的地方華人社團，非但未能享受到古巴政府給予的相應優惠，少有中國方面的關注與支持，反因受古巴社會歷史傳統與國內整體經濟結構發展不均等因素的影響，在當前首都哈瓦那與外省地區經濟發展水準日益失衡的局面下，^⑳與哈瓦那等地部份華人社團的整體差距不斷加

^⑮ 訪談記錄：楊新新、李柏達訪問鄭啟巨集，2018年7月6日，哈瓦那中華總會館。

^⑯ 黃卓才，《古巴隨筆——追尋華人蹤跡》，頁178-179。

^⑰ 訪談記錄：楊新新、李柏達訪問黃錦芳女士（Caridad Wong Lui，哈瓦那黃江夏堂主席），2018年7月5日，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餐廳。

^⑱ 訪談記錄：楊新新訪問呂美枝，2018年7月7日，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餐廳。

^⑲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 José G. Fong Pérez 先生（聖地牙哥民治黨支部主席），2018年7月19日，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餐廳。

^⑳ Richard E. Feinberg, *Cuba's Forgotten Eastern Provinces: Testing Regime Resiliency* (Washington: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2019), 1-15.

大。¹⁶² 據研究者對哈瓦那以外地區古巴地方華人社團的實地調研發現，現今古巴僅存的五家地方華人社團，除個別社團受益於當地旅遊業發展，以及社團領袖擁有較強個人能力與社會關係網路帶來的資源與機會，尚能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良性發展之勢外，¹⁶³ 其餘華人社團基本處於聊以卒歲的狀態，甚至隨時面臨着倒閉的危險。¹⁶⁴ 其整體狀況與處境比之哈瓦那地區部份華人社團方興未艾之勢，可謂大相逕庭。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見，目前無論古巴華人社團存在的整體發展水準比之世界其他地區相對滯後，亦或哈瓦那華人社團內部及其與外省地區華人社團間差距分化明顯等問題，無疑係由古巴相對特殊的社會主義內外環境條件所致。但與此同時，這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古巴社會主義「更新」時期，相關改革與發展政策亟待調整與完善。故而，這也進一步表明，本地華人社團在社會主義「更新」時期與未來，可能仍然面臨着更多意想不到的新困境與挑戰，有待各方加強研究，並儘早做好相關的應對準備。

五、結語

作為時至今日全世界範圍內為數不多仍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左翼國家，由於其不同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相對特殊的政治制度環境，受資料來源限制以及所謂普世價值等冷戰意識形態話語等之影響，目前無論自恃中立的學院派研究者，亦或帶有極強認知偏好的民間學者與公眾媒體人等，即便曾有過古巴本地的實際訪問與田野經驗，亦基本眾口一詞的堅持，古巴革命後，在中古關係不斷惡化的大背景下，歷經古巴社會主義改造、族裔整合與國有化運動後，古巴華人社團與本地華人社會一度備受古巴政府的剝削與打壓，

¹⁶² América Hernández García, *Presencia de La Cultura China en Las Tres Regiones Históricas de La Antigua Provincia de Las Villas* (Villa Clara: Centro Provincial de Superación para la Cultura, 2001), 20.

¹⁶³ 訪談記錄：楊新新、Laura González Luis 訪問陳細九先生（謝戈德阿拉維民治黨支部主席），2018年7月1日，謝戈德阿拉維民治黨支部；楊新新訪問唐仲禧女士（西恩富戈斯民治黨支部主席），2018年7月3日，西恩富戈斯唐仲禧家中。

¹⁶⁴ 訪談記錄：楊新新、Melody 訪問 Lázara Chiong Frias 女士（關塔那摩民治黨支部主席），2018年7月10日，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古巴總支部餐廳；楊新新、Melody 訪問 Fausto Sing Eng 先生（聖克拉拉民治黨主席），2018年7月10日，哈瓦那 Melody 家中電話採訪。

最終慘遭歷史「拋棄」，喪失相對獨立的經濟社會地位與自主性，徹底「銷聲匿跡」於古巴的「公共社會生活」中，迄今幾乎不再可見「任何的生命跡象」。¹⁶⁵

然而，通過上述論述可知，儘管古巴革命後，由於本地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古巴華人社團確也曾一度因制度環境的轉變而受到較大程度的衝擊與影響，不過，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古巴華人社團，卻並未因此出現類似部份蘇東或亞洲社會主義國家華人組織完全遭到禁絕的情況。事實上，反倒是受益於古巴革命以來，中國大陸與古巴較為特殊的社會主義外交關係，卡斯特羅等人在對待社會主義與外僑組織等問題上相對寬和且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立場與態度，以及古巴建設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時期經濟繁榮帶來的紅利，古巴本地華人社團不但部份保留並維持了古巴革命前為華人提供互助福利、延續族裔文化、聯繫家鄉與在地國等功能結構；同時，借助冷戰結束以來內外條件的變化，以及古巴政府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調整與「更新」，本地華人社團非但在經濟實力上與社會文化功能等層面實現較大幅度的提升與發展，甚至還在本地公共政治生活中，獲得一定的話語與博弈空間，某種程度上復興與重構此前一度遭到限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當然，儘管社會主義政治形態下，古巴華人社團至今並未如前人研究所言出現趨於消亡之勢，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由於古巴革命以來，古巴本地社會長期與外界封閉隔絕，古巴本地社會經濟發展水準與對外開放程度較之世界其他地區而言總體上仍相對滯後，華人新移民遷入本地之進程也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因制度環境的變化而被迫停止；加以受歷史傳統與現實政治經濟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古巴首都哈瓦那與外省地區經濟發展水準分化差異明顯，長期以來哈瓦那華人社團與外埠地方華人社團所處之整體環境與境遇可謂大相逕庭。故而，比之世界其他地區的華人組織，目前古巴本地華人社團整體存在着會員數量與組織規模不大、當地語系化色彩較濃鬱、參與全球性跨國主義活動之頻率不高、華人社團內部份化明顯等問題，顯示社會主義制度下，古巴華人社團相對特殊的路徑發展模式以及較為多歧複雜的跌宕起伏命運，成為目前全球為數眾多且形色不一華人社團中之特有案例。

（責任編輯：唐金英）

¹⁶⁵ 程映紅，〈卡斯特羅無恥剝奪華裔古巴人歷史見證〉，2016年11月26日，<http://www.aboluowang.com/2016/1126/841494.html>。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a Socialist State: The Historical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uban Chinese Associations after the Cuban Revolution

Xinxin 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ban Revolution led to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f Cuba'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Cuba. However,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Cuba were not completely banned, unlike som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European and Asian socialist countries shown in previous studies. Instead, benefiting from Cuba's relatively special socialist system, Cuban Chinese associations partially maintained some functional structures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Cuban Revolution, such as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ir members,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e, and connecting their hometown and their country of residence. Furthermore, with the adjustment and "actualizer (renewal)" of the "orthodox" socialism by the Cuban govern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Cuba not only achiev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 economic strength, but also gained more power and space in the local political public life.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Cuba wa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for a long time, and it had a low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Under the

Xinxin 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yangxinxin870325@126.com.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Cuban Chinese associations faced many problems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problems included the small number of members, high level of localization, low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transnationalism activities, and vast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ssociations. These elements together show the special path-dependence and complex fate of the Cuban Chinese associations under socialism, which made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Cuba a rare and unique case among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cross the world.

Keywords: Cuba, Chinese associations, socialism,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